

发展型安全

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

钟飞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展型安全

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

钟飞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型安全：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钟飞腾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ISBN 978 - 7 - 5203 - 0303 - 3

I. ①发… II. ①钟…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3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张蕴岭^{*}

钟飞腾博士完成这本《发展型安全：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书稿，要我写一篇序言，虽有些为难，但盛情难却，只好从命。

作者把发展型安全作为主题，把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秩序重构联系起来，试图以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崛起背景下对自身安全环境和周边秩序的构建，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性和现实意义的议题，也是一项带有创意性的研究。

安全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最严峻问题。在自身衰落的情况下，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中国失去了捍卫自己利益和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能力，成为被侵犯、被瓜分的病夫之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衰落的下行线，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安全问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应对，有时甚至不得不卷入战争。究其原因，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经济不发达，实力不强，甚至陷入贫困。就对外关系来说，在此情况下，中国与周边绝大多数国家基于发展利益的共享性很小。应该说，当时，除了冷战对抗格局和中苏分裂的政治因素外，发展滞后是国家安全脆弱的内在病因。

改革开放是中国做出的一个重大理念与战略转变。理念上的转变

^{*} 张蕴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体现在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作为第一要务来抓，而战略上的转变则体现在为发展而主动开拓安全环境上。前者改变了中国的资源和作为方向，把主要资源、精力和政策导向转向发展经济，为此，大力推动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加工制造业；而后者转变了中国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主动改善和发展与他国的关系，缓解外部安全威胁，为此，邓小平先后出访美国、日本、欧洲和东南亚，主动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显然，以发展为中心的安全环境构建，让中国走出被动维护安全的状况，实现了安全环境的主动创建。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有所作为，积极推动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争端，完成了除印度外的陆地边界勘定，同时，积极参与多种区域合作机制。这样，既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又为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由此实现了发展增进安全和安全推动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正如作者所说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安全，不过，为实现发展而主动创建安全环境，因发展进步和综合实力提升而使安全环境得以改善，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种互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安全与众不同，有着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影响因素和战略性考虑，既有历史遗留和现实存在问题的交织，又有基于现实问题的考量和未来秩序构建所涉及的联系。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提升，总的来说，既有安全环境的创建，也有关系和秩序构建的双重含义。我把这种多重含义大体归结为：其一，中国的陆海综合环境全面建设。在地缘上，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因此，越来越需要综合起来加以设计和建设。在这种建设中，一则，中国不会，也不可能走传统大国扩张、独霸的道路；二则，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发展理念的和平发展环境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只有中国才会，才能够提出基于合作发展与合作安全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二，和平解决争端，构建新型周邻关系。近代衰落的历史，还有新的国际海洋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中国遗留或者凸显出诸多争端，有陆、海领土、海域的，有历史人文的，还有国家分裂方面的，处理这些问题难以用简单的办法，一则，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对策；二则，需要着眼于综合的

发展需要。因此，中国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当然，如何把握利益诉求与维护稳定与和平环境，对中国来说并非易事，既需要以实力作为基础，也需要进行智慧操作，更需要相关各方的合作意愿与行为。其三，处理好大国关系，其中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努力创建一种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开创性定位和努力，当然基于中国自身发展安全环境的需要，但也有新的理念支撑。其四，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近代以来失去了对地区关系和秩序的构建能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重构地区关系和秩序是一个必然和自然的进程。尽管中国不是要重新回归主导，而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新关系和秩序，但这毕竟是一场大的变革，在认可度上，也不是能“一呼百应”的。新关系和秩序的共识和建设基础需要时间、耐心和中国本身行为的积淀和检验。

本书作者提出关于发展力量对安全影响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力量的提升并不总是能提供正能量和正向反应的。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英美地缘政治模式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逻辑中，发现、培育和扩展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逻辑，让周边国家逐步相信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各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构建新地区关系和秩序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学者来说，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的。

发展型安全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且带有创新含义的立论，或者说一个命题，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只是开了一个头，希望作者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寻中国崛起	(15)
第一节 中国崛起的双重特征	(16)
第二节 为什么人均 GDP 是重要的	(21)
第三节 中国贫穷与“百年屈辱”	(28)
第四节 东亚发展与中国的增长	(32)
第五节 对东亚(中国)崛起的国际问题研究	(40)
第六节 重新理解外部(周边)环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	(44)
第二章 作为大战略的发展型安全	(51)
第一节 发展阶段与国家安全观的多样性	(53)
第二节 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的美式国家安全战略	(59)
第三节 作为大战略的发展型安全	(64)
第四节 美式安全观与发展型安全能融合吗	(79)
第五节 发展型安全与亚洲新安全观	(81)
第三章 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周边	(87)
第一节 “周边”概念的生成与周边外交	(88)
第二节 确立经济增长目标与中国经济的亚洲化	(99)
第三节 地区秩序转型与“周边环境”概念的完善	(109)
第四节 “周边”与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革新	(114)

第四章 评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121)
第一节 安全环境概念的相关文献	(122)
第二节 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已有评估	(126)
第三节 评估新时期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框架	(131)
第四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指标体系与评估	(134)
第五节 结论	(142)
第五章 中国的海洋战略	(145)
第一节 作为国际战略研究议题的南海争端	(147)
第二节 中国愿意遵守国际海洋制度吗	(151)
第三节 即将到来的中美海上冲突？	(160)
第四节 中国正在主导周边秩序的调整吗	(172)
第六章 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问题	(178)
第一节 理解南海问题中的东盟需要新的视角	(180)
第二节 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中的南海问题	(187)
第三节 海洋法领域以陆制海与以海制陆	(192)
第四节 重新认识中国—东盟在稳定地区 大局中的作用	(197)
第七章 美国的雁形安全模式	(205)
第一节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模式与争论	(206)
第二节 雁形安全模式	(211)
第三节 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218)
第八章 美国体系的转型	(227)
第一节 美国是一个体系	(228)
第二节 美国主导的体系正在转型	(233)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秩序转型	(252)
第四节 中国的发展战略空间	(257)

第九章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	(264)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与国家兴衰	(265)
第二节 “枢纽”与“印太”地缘战略	(271)
第三节 亚洲地缘重心的大偏移	(277)
第四节 中国的亚洲地缘新视野	(285)
第五节 超越对抗性地缘政治思维	(291)
第十章 拓展海外利益	(294)
第一节 国家大战略中的对外经济战略理念	(294)
第二节 对外援助、经济制裁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300)
第三节 政治目标与对外经济关系的格局	(309)
第四节 维护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	(327)
第五节 以海外利益为先导塑造新秩序	(331)
参考文献	(338)
后 记	(355)

导 论

将发展与安全关联起来，并在周边地区进行实践，逐步推动一个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和平环境，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重塑周边关系中倡导和遵循的战略原则。本书主要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将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崛起背景下如何处理与周边关系。用一句话概括，这一阶段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成功之道，笔者认为是牢固树立发展的首要战略目标，始终明确并连贯地将安全问题纳入发展的大框架中，构建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环境。而这也是“发展型安全”（Developmental Security）的基本含义。

本书大体上按照定义周边、评估外部总体环境、纳入海洋新问题、拓展与美国体系的关系等展开，并最终导向中国大战略的根本特征。最核心的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必须兼顾发展与安全；即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这样一个双重任务，中国的特色在于它是由发展而非权力定义安全大战略。从基本学理思路看，本书基本上是从政治与经济两条线索的互动来展开论述的，并追求从本源上探讨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原始风貌，因此很多篇章对概念的历史背景有较为深入的交代。本书提出，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中国在周边地区所面临的挑战是地缘政治层面的，这是中国最终崛起的表现和结果，也是崛起进程中不得不设法周旋的重大挑战。

一 发展型国家与“发展型安全”

在交代本书的章节内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笔者是如何构思“发展型安全”这个概念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弗农（Ray-

mond Vernon) 在回忆《主权困境》一书时曾提到，如果作者想让人记住一本书，可以使用一个模糊的标题。^① 作为一名因研究跨国公司问题而闻名于世的专家，弗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明了“主权困境”这个术语，意指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面对跨国公司时很可能失守。弗农将国家主权与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安全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经济力量的关联性。“主权困境”这个概念提出伊始，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当时跨国公司还是一种新兴势力，人们对它的影响力有很大争议。1976 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将主权困境模式概括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三种视角之一，此后人们接受了这种说法。^② 一个经济学家发现了国际政治问题，而另一个政治学家通过倡导经济学家的术语，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的大发展。在这背后，主要是两人所处的背景的一致性，即美国面对波澜壮阔的世界经济也得重新思考出路。

追求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适用于分析国家崛起和衰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以及美国这样的霸主的衰落。一百多年来，中国追寻国强民富，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开始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20 多年来我们生活其中的市场体系，与西方人在教科书、日常舆论以及国会辩论中所强调的自由市场、协调市场等都不同，中国体验和发展的经济并非西方的那个经济系统。但在中国的外部，具有强大优势地位的却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政治方面，中西方的差异更大。但这种差异并不妨碍中国人追求更好的生活，事实上，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人整体上快速提高了生活水平。因此，把握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去寻找持续推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仍然是未来中国绕不过去的

①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the U. S. Enterprise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1.

② Robert Gilpin, “Revie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ree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1 (Mar., 1976), pp. 184 - 191.

主题。

20 世纪后半期，一度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是日本。从国际角度分析的话，这一阶段日本崛起的案例对中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而且，观察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大陆的日本发展历程，要比眺望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更能在知识体系上认识中国发展的成就和挑战。这大概也是笔者在构思“发展型安全”时，多次思考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的原因。^①在这本书中，约翰逊构建了一个新概念“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约翰逊的视角是国内的，关注通商产业省这个官僚机构在推动日本发展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约翰逊选定 1925 年作为日本产业政策发挥效力的阶段，对认识那个时候的日本国情以及日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中日战争有重要启示。而将 1975 年作为结束点，也有积极意义。按照已故经合组织经济学家麦迪森的统计，1925 年，日本的人均 GDP 为美国的 30%，在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缩小至美国的 43%（1939 年）。但与美国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人均 GDP 急剧缩小，绝对额退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阶段，战败的那一年不到美国的 12%。此后日本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获得发展，而在国内施行的仍旧是“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1958 年，日本的人均 GDP 占美国的 31%，首次超过 1925 年的占比。到 1975 年，也即约翰逊选定的“日本奇迹”结束点，日本人均 GDP 占美国的近 70%，17 年增长了 3.5 倍。同样的对比方法如果运用于中美，则 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为美国的 5%，2010 年上升至 26%，32 年间增长了 28 倍。^②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后来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访问日本。1981 年 4 月，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 2000 年的战略目标是人均 GDP 达到 800 美

^① Chalmers A.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该数据库更新至 2010 年，<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元。^①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1980年，中国人均GDP为307美元，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54美元，如期实现了邓小平20年前规划的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政府一直倡导对外开放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环境。2015年，以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均GDP占日本的36.7%、美国的25.3%。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1/20缩小至1/4，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本书认为，中国政府将增加人均GDP作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人均GDP不足以代表和衡量一个个体的生活质量，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中也不占有一席之地，但中国的成功却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西方追求财富和权力的道路。权力、利益、观念和制度，任何一个变量单独拿出来考察中国的崛起，都难以抓住根本所在。关键在于政治和经济的互动，造就了今天中国的发展。在看到日本的巨大成功之后，中国主动融入日本主导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得以快速利用其劳动力资源，同样发展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于90年代后期在一些产业领域快速追赶日本，直至2001年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更为快速地赶超发达国家，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再度陷入泥潭，中国决定进一步调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共同性而言，中国已被广泛认为是东亚地区“发展型国家”的一员。^③

基于比日本更为特殊的地缘特性，以及“朝贡秩序”对中国政治智慧的影响，中国堪称比日本采取了更成功的发展模式。自明治维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18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③ Shaun G. Breslin,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or Dysfunctional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4, 1996, pp. 689–706; John B. Knight, “China as A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World Economy*, 2014, pp. 1335–1347.

以来，日本人通常认为自己是东亚的英国。^①事实上，日本最大的岛屿面积确实也与英国本土相当，大约 22 万平方公里。日本作为岛国的战略环境，与英国也的确有很大的类似性。但是，中国的地缘环境是相当特殊的。^②除了陆海兼备外，最典型的是邻国数量众多。如果仅计算陆地邻国数量，那么在所有的大国中，中国的邻国最多，其次是俄罗斯、法国与巴西。当然，如果考虑到英、美、法等国拥有并保留至今的各种海外领地，计算这些领地的相邻国家，那么英法的邻国就比中国多，甚至美国的邻国数量也接近于中国。

在主权国家构成的当代世界中，这种地缘特性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无法坚持旧的领土和安全观念，而势必尊重国际法对边境的基本界定。由于“朝贡秩序”的影响，中国也比其他大国经受着相邻国家更多的直接关注，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因此，中国必须更为注意发展与周边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中国与周边关系作为整体来处理，也是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张蕴岭也指出，中国对外关系处理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周边视作一个整体，并将周边作为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③由此便凸显出一个事实：中国是不同于日本的一个独立战略行为体。中国在主权上完全独立，在安全战略上拥有相当强的自主性和较大的运筹空间。在遭遇国内、国际危机时，中国有独立的意志调节发展与安全两个杠杆，维持中国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动力。

中国政府不断革新对安全观的认识就体现了这一点。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政府逐步提出并实践“新安全观”，并在 21 世纪的

① 比如，1889 年日本国宪法起草者之一金子间太郎（1853—1942 年）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认为：“日本群岛在亚洲相当于英国在欧洲的独特和优越地位……日本今天面临的挑战，犹如 19 世纪初英国面对拿破仑的威胁一样，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逊色于当年的英国。” Baron Kentaro Kaneko, “Japan’s Position in the Far Ea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6,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Jul., 1905), pp. 77 – 82.

② 张文木对中国数千年来地缘格局变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并强调当前中国地缘政治形势与欧美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论》，海洋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 张蕴岭：《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二个十年发展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从其组成来看，不仅接受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也接受了罗马俱乐部特别关注的可持续安全概念，而且日益重视发展海洋权益，将建设海洋强国视作国家战略目标之一。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日本开创的东亚发展路径，同时也在安全上革新了理念，照顾到亚洲各国的发展现实和亚洲安全的多样性。2014年4月，中国政府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①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一点是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张文木就有如下论述：“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80年代之后中国的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②西方也有学者认识到，亚洲国家不仅在发展上处于后来阶段，就是在安全观上也不能简单套用欧洲和美国的经验。^③但在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研究的界定中，并没有形成将安全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学术传统。在英国学者范达娜·德赛与罗伯特·B.波特主编的《发展研究指南》第2版（中文版厚达1100页）中，第九部分为“暴力和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但从其所列的12个主题来看，甚少有涉及大战略层面的安全问题。即便提到“发展安全化”，也多是基于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层面的人类安全概念。^④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② 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论》，第213页。

③ Mark Beeson, “Security in Asia: What’s Different, What’s Not?”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 No. 1, 2014, pp. 1–23.

④ 蒂莫西·M.肖：《和平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和人类安全》，[英]范达娜·德赛与罗伯特·B.波特主编：《发展研究指南》（下册），杨先明、刘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83页。

二 与“发展型安全”类似的概念

196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已8年并在美国学界有一定地位的人江昭（Iriye Akira）发表《和平的发展主义与日本》一文，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发展路线。^①“和平的发展主义”这个词与中国在21世纪初提出的“和平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日文文献来看，人江昭构造的“和平的发展主义”这个词似乎并没有在日本流传开来。

对日本发展战略更为流行的概括是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提出的“吉田路线”（Yoshida Doctrine）。196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不久的日本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发表了《宰相吉田茂论》一文，将吉田茂的哲学定义为“商人性质的国际政治观或经济中心主义”，并认为吉田内心深处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在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一国的繁荣和富强。尽管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少数派，但最终被日本大众所接受，成为概括这一时期日本国家战略的标准见解。^②吉田茂是外交官出生的政治家，1906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即考入外务省，到1946年担任首相首次组阁之前，有整整40年的外交生涯。担任外交官时，吉田茂的足迹遍布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伊朗等，对世界形势的洞察和把握在日本无与伦比。吉田茂晚年应邀为大英百科全书书写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词条时，有过这样的说法：“日本自从与外国建交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为原则的，破坏了这个基本原则，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是投入轻率的战争的原因。”^③吉田茂对日本必须与世界主导者搞好关系的看法是吉田路线的核心。1975年，日本产业政策的设计者之一、原任通产省

① 人江昭「平和の発展主義と日本」（『中央公論』1969年10月）。

② 参见〔日〕大嶽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第四章，吕耀东、王广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副大臣的天谷直弘认为，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后，“看到了一个比明治维新以来更加自由的世界，意识到等待很久的快速经济增长终于可以实现。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日本，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的稳定环境中变得清晰可见”^①。这实际上就是日本对外部环境与本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妥协观点。

日本政治学家猪口孝认为，日本国际政治发展中存在一个每过15年就会发生重大转变的特性。他将吉田路线的执行时间界定为1960—1975年，并认为1975年后日本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体系性支持者（systemic supporter）。^② 笔者认为，日本执行吉田路线的时间远远超出了15年，为了确保日本的经济增长并缓解日本权力增长所引发的地区压力，日本的外交做了很多工作。美国学者甚至直到最近还认为，吉田路线仍然约束着日本。^③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勇博士认为，安倍晋三政府正在谋求摆脱“吉田路线”，致力于构筑“新海洋国家战略”。^④

近期，与“发展型安全”主旨最为接近的学术概念可能是“发展型和平”（Developmental Peace）。2015年，瑞典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教授斯坦·托尼森（Stein Tønnesson）发表《解释东亚的发展型和平：经济增长的红利》一文，他认为，东亚之所以会保持和平，原因在于一国接一国地将经济增长作为优先目标。^⑤ 为了解释东亚自20世纪70年代末保持和平状态的动因，托尼森教授在乌普萨拉大学领导了一项长达6年的研究课题“东亚和平项目”（2011—2016年），研究

① 转引自 Masataka Kosaka, “The Showa Era (1926-1989),” *Daedalus*, Vol. 119, No. 3, 1990, pp. 43 - 44.

② Takashi Inoguchi and Paul Bacon, “Japan’s Emerging Role as a ‘Global Ordinary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6, No. 1, 2006, pp. 1 - 21.

③ Gerald L. Curtis, “Japan’s Cautious Hawks: Why Tokyo Is Unlikely to Pursue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2, 2013, pp. 77 - 86.

④ 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

⑤ Stein Tønnesson, “Explaining East Asia’s Developmental Peace: The Dividends of Economic Growth,” *Global Asia*, Vol. 10, No. 4, 2015, pp. 10 - 15.